目摇摇录

上篇 :文化生态与 圆世纪报告文学 员

导摇论 猿
摇一、报告文学发生期研究诸说辨析 猿
摇二、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流变 远
摇三、报告文学 :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 圆员

第一章摇近代文化转型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 猿缘
摇一、报告文学 :作为近代新闻文化的产物 猿远
摇二、报告文学 :作为近代政治文化的载体 源园
摇三、报告文学 :作为近代写实文学观的实践 源源

第二章摇发生期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形态 缘员
摇一、取事与传播 :制作的新闻性 缘园
摇二、觉世与新民 :主旨的启蒙性 缘缘
摇三、杂体与文学 :表达的互文性 远园

第三章摇左联的文化策略与报告文学的崛起 远源
摇一、契合 :左联属性与报告文学体性 远怨
摇二、实践 :价值定位与多维运作 苑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三、崛起:报告文学年的存量与意义　愿愿

第四章摇政治文化制导与报告文学的演化　怨园
摇一、政治化的时代与政治化的报告　怨愿
摇二、主体的单向归属与作品的两极模式　员园园
摇三、非知识分子时代的大众写作　员愿愿

第五章摇现代文化建构与报告文学的自觉　员愿愿
摇一、主体自觉:时代承诺与本我确认　员园源
摇二、功能强化:批判性主旨与启蒙价值　员愿员
摇三、文体转型:走向开放的报告文学　员怨愿

第六章摇边缘化时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　员怨愿
摇一、生态变异: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语境”比较　员怨源
摇二、精神坚守:另类现实的关注与批判　员怨苑
摇三、文体退化:前沿躲避与思想短缺　员远源

下篇:文化生态与新世纪报告文学

第七章摇新世纪报告文学景态分析　员远愿
摇一、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复调性”的存在　员远愿
摇二、报告文学:虚拟的问题与现实的问题　员苑园
摇三、可能与现实:走向强势的报告文学　员怨园

第八章摇纪实(报告)文学的年度观察　员怨愿
摇一、纪实:为明天存活历史　员怨愿

摇二、纪实：回到日常生活的言说 圆装
摇三、纪实：“欲望时代”的人的报告 圆园
摇四、纪实：记忆的价值与报告的尺度 圆苑
摇五、纪实：人生命运与人性况味的书写 圆装

第九章摇新世纪报告文学对话 圆园
摇一、事件·创作·批评：当下报告文学局势观照 圆园
摇二、圆园源年报告文学关键词 圆愿
摇三、圆园缘年报告文学观察录 圆远
摇四、圆园远年报告文学印象记 圆缘
摇五、圆园苑年报告文学的年景写意 圆员
摇六、作家、文本与理论：晚近报告文学脉象透视 圆愿
摇附、报告文学猿园年：时代的文体和文体的时代 圆源

主要参考文献 圆源

后摇记 圆苑

上摇摇篇

文化生态与 圆园世纪报告文学

导摇摇论

一种新创独特的文体——报告文学，差不多与剧变而多质的 圆园世纪同行。真正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写作形态，它描画出主体变动不居的心路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存活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历史。这是一段让人感奋，同时又令人沉郁的历史。因而，毋庸置疑，它具有思想文化史的价值。报告文学以其非虚构的文体规则，以对历史性现场的触摸与近距离的摄照，为我们真实地全景地记录了社会变迁中风云际会的历史图景。这样，它所具有的历史文献式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从文学本身而言，报告文学无疑丰富了 圆园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存。有一个不争的史实是无法改写的：在 圆园世纪 猿园年代和 愿园年代的中国文学格局中，报告文学曾是一种颇富实绩的文体，成为文学时潮中的主潮之一。

一、报告文学发生期研究诸说辨析

报告文学（砸藻澡藻蚤藻藻藻

相对于文体称名时间所具有的某种确定性，学界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时间存有诸多异说。文体发生期是文体学研究中一个基础性的重要课题。只有正确地把握某一文体的基本特征、属性及其发生的根因等，才能正确地指称这一文体发生的特定时期。关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时间，主要有四种界说。一是“古已有之”说。报告文学作家刘白羽等持这样的观点。曾任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积极倡导报导文学的高信疆，就认为报导文学（即报告文学）“它该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学才对”；“一部《诗经》正是报导文学在中国的滥觞”，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报导文学家”①。在晚近出版的《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中，主编高文升也奉持“古已有之”一说。作为对这一观点的实证，高文升列举了唐朝骆宾王、宋代文天祥和清代方苞的有关作品。作者认为“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报告文学的先声”；“文天祥写于公元 [illegible] 年的《指南录后叙》，应当说更具报告学性质”，而“到了清代，较为典型的古代报告文学作品便脱颖而出。方苞的《狱中杂记》，就是其优秀代表作”②。二是近代说。袁殊在三十年代初发表的重要论文《报告文学论》中指出：“‘报告文学’这一名词在中国还是很新的。……这文学的形成，自然不会是古已有之的；它是一种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③阿英、黄钢、冯牧、蒋孔阳、朱子南等都持有和袁殊相同与近似的观点。朱子南指认 [illegible] 世纪后半期到 [illegible] 年为中国“报告文学的萌生期”④。张春宁则将报告文学的发生期明确地定为 [illegible]—[illegible] 年，认为梁启超发表于《清议报》（[illegible] 上的《戊戌政变记》是“中国报告文学诞生的标志”⑤。三是“五四”说。周而复、蓝海（田仲济）、赵遐秋、杨如鹏诸家都禀持此说。蓝海指出：“中国的‘报告’或‘报告文学’应产生于中国新文学的

① 高信疆：《永恒与博大——报导文学的历史线索》，收入陈铭编报导文学讨论集《现实的探索》，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illegible] 年版。

② 高文升：《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新时期纪实文学研究》，河南文艺出版社 [illegible] 年版，第 [illegible] 页。

③ 袁殊：《报告文学论》，《文艺新闻》第 [illegible] 号，[illegible] 年 [illegible] 月。

④ 朱子南：《中国报告文学史·绪论》，百花文艺出版社 [illegible] 年版。

⑤ 张春宁：《中国报告文学史稿》，群言出版社 [illegible] 年版，第 [illegible] 页。

发轫时期，即五四新文学时期。”① 蓝海等将《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illegible]）、《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illegible]）、《饿乡纪程》（[illegible]）和《赤都心史》（[illegible]）视为报告文学发生期的代表性作品。四是[illegible]世纪[illegible]年代说。持此说者有以群、罗荪、贾植芳、林非等。以群断言：“在[illegible]年的‘九·一八’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文学。”其根据是‘那时，即或有少数类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也未被称为报告文学，因为当时‘报告文学’这一名词还未被确立起来。”②

研究者对报告文学发生时间的不同指认，这反映了他们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的属性的认识存有差异。在我们看来，报告文学是一种以非虚构为规则、以社会关怀为主旨、以现实生活为主要报告对象（亦可反映具有现实性的历史题材）的具有新闻性文学性与论理色彩的边缘性文体。作为一种具有显性新闻特征的文体，它从新闻文体中衍化而出。因此，新闻事业的发展成为这一文体发生的前置性条件，新闻文体是其母体。作为一种颇重思想性的关注社会公众事务的写作方式，它需要有一个相对开放的具有某种自由度的言说空间。非虚构性是报告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但并不指代其属性的全部。古代有大量的非虚构性作品。但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的封建社会中，不可能设置一个自由言说的论坛，也没有生成具有普泛性的面向更广大受众的新闻事业。因此，从总体上说，古代中国尚不具备报告文学的发生条件，这样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中国社会初步具备报告文学的萌生条件，一直迟到近代。封建王朝行进到晚清这一站，已如拖拉着破车的老牛，步履蹒跚。内忧外患，西风东渐，王纲解纽，思想活跃蔚然而成潮流。列强以坚船利炮撞开天朝尘封日久的大门，同时，他们将创办报业当作文化殖民的重要手段。受此影响，中国人在[illegible]世纪中叶以降，也开始建设自己的近代报业。晚清国人自办报刊数以百计。凡此情由，都为报告文学这一新文体的生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考诸史实，我们发现正是在近代，具有报告文学属性的作品开始批量地出现了。

---

①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长足进展的报告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illegible]年版。

② 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苏文化》第[illegible]卷第[illegible]期，[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

以群等依据报告文学文体称名始于 20世纪30年代这一实情，认定报告文学发生在 30年代。这一观点是不够科学客观的，它既忽视了报告文学已在此前存在的事实，又背离了文体形成的一般规律。考察文体发展史，我们可以知道，一种文体的实际形成与文体的命名，往往并不是共时态完成的。即如散文，从词汇学的角度看，散文一词大约最早见于《文选〈海赋〉》，其中有“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句，而具有文体学意义的散文概念，通常认为似由南宋周益公首先提出。周益公评说宋代骈文时认为“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刘錡赠官制》），但散文作为一种实然存在的文类却早已出现在文学史上。报告文学的情形类似于散文，只是文体的萌生与文体命名之间的时差并不像散文那样大罢了。至于有学者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期确定为“五四”时期，这不能说没有依据。但实际上报告文学的萌生形成是一个渐行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期包含了“五四”时期，而其发端是在此前的晚清。“五四”运动并不是一种无源之流，晚清的维新运动是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学的根系在晚清。考辨关于报告文学发生期的诸家观点，我们以为还是近代说比较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因此，我们奉持报告文学发生于近代的基本观点。研究的对象是晚清至 20世纪末百余年间有关报告文学的诸种存在。

二、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流变

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生成了它的诸多特异。文本与报告对象之间所具有的同质性，意味着报告文学只能是一种选择的艺术或曰选择性的文体。这就决定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具有一种与其他文体所不同的更为直接的对应关系。小说可以虚构生活，诗歌可以“向内转”，抒写自我浩瀚的心灵，而报告文学作家无法拒绝生活、逃避生活，而只能介入生活，在现实的前沿地带作一种在场的深度报告。由此可见，一定时代的现实存在不仅直接成为报告文学反映的具体对象，而且由这种现实存在及其关系所形成的文化生态，直接影响着报告文学作家对于现实的选择与评说。这样不同时代文化生态中产生的报告文学自

然就呈现出不同的景态。文化生态的变异，从根本上关联着报告文学内在的流变。

文化生态是我们研究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关键词。文化生态这一范畴关联着两个基本的概念，即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定义正像文化本身一样异常复杂。爱德华·泰勒爵士于 灵苑员年给出了一个具有“标准”意义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所接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各种能力和习惯。”[①]但此后人们并没有放弃定义文化的权利，现在有关文化的诠释已是成百上千的了。在我看来，文化可简言之为人与人化的存在。与文化相比，生态的定义似简化得多。它通常是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制约而达到相对的平衡。与此相关的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之间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提取借用生态或生态学中有关关联性结构性的机理，我们或可将文化生态指称为一定时代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呈现的形态，所形成的一种具有特征性的文化结构。

运用生态学的某种原理、方法研究人类文化，学术界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早在 灵缘苑年，日本学者梅棹忠夫首次用生态史观——以生态学的方法探索世界文明史发展规律，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②]。美国人类学家普洛格和贝茨撰著了影响甚广的《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据作者自称，他们“所采用的主要是生态学和进化论的方法。个体作出决定，人和社会的适应策略及这些方面的进化过程，是本书的中心主题。”[③]普洛格和贝茨认为：“人类是文化动物，这是由于三种生态学适应机制的相互影响——人类的自我保护基本动力，人类对具有生存价值的社会生活的要求和人类对于在周围世界中认识有序现象的推动。按照这种观点，这三种生态学上的基本要求不仅可以解释文化的起源，而且也是文化普遍性的关键。”[④]

---

① 参见博克：《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辽宁人民出版社 灵愿愿年版，第 员员页。

② 参见《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王子今译，上海三联书店 灵愿愿年版。

③ 普洛格、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再版前言》，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灵愿愿年版。

④ 《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 运缘页。

晚近于[illegible]年代前后西方出现了所谓生态后现代主义（[illegible]），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生态女权主义（[illegible]）理论家斯普瑞特奈克，主张用“相关性，转化、包容、关心和爱来取代西方父权主义力主分立、异化、对立的二元论和穷竭自然资源的世界观”①。

我们将文化生态的理念引入报告文学的研究，无意将生态学的范畴作教条式的生搬硬套，而是试图运用其相关性的系统方法，建构适合报告文学的研究模式，以更有效地探求报告文学内在流变的若干规律。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包括我们所研究的报告文学在内，它是一种“场效应”的结果。“文化从来不可能在理想的纯粹的条件下发展，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文化的‘场’。”“所谓‘场’或‘力场’，本义是指文化处于多种力的错综纠结的相互作用中。”②从这一点看来，文化的“场”也就是文化生态。报告文学的萌生与发展正是由多种文化因素合力所致。与报告文学密切关联的文化生态，它包含着诸多的因素，主要有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物质经济的水平、社会生活的样态和主体的人文精神情怀、话语立场以及受众的文化境界等。我们之所以认定中国报告文学发生于近代，这是因为近代已初步置备了这一文体萌发的生态条件。

论及报告文学的发生，茅盾曾有一段著名的表述：

> 摇摇每一个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待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由产生而且风靡的根因。③

茅盾给出了影响报告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要素，包括时代的“匆忙而多变化”，读者知晓生活的信息渴望，作家社会职志的履行和刊物的价值

---

① 参见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载塔克等编《世界观与生态》，奥比斯图书公司[illegible]年版。

② 周宪主编：《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多元透视·导论》，上海远东出版社[illegible]年版。

③ 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illegible]期，[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

实现等，这些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生态，不仅使报告文学的产生成为可能，而且显得十分必要。而这样的文化生态只有到晚清方始形成。首先，作为报告文学刊布的主要载体，能够满足读者大众信息需求的报刊，它的大量出现是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结果。中国此前虽然有邸报等报纸，但只是在封建政权的体制内发行。而近代的报纸，虽不像今天这样面向更广泛的社会大众，但它的受众已遍及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报纸已成为一个面向社会的信息中心，有的报纸还成为评说国是时事的论坛。其次，报纸的大量创办和作家对于时事的论评“解剖”，这需要有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萨特曾经说过：“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①]晚清远不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但它较之于古代社会，其封建统治已显颓势疲软。迫于时势，朝廷于灵愿踪年发布诏书，准许自由开设报馆。一时报业广开，学会林立，思潮风起。再次，近代是一个风雷激荡、波诡云谲的历史时期，原有的文体不适应反映这样的社会存在，因此需要有一种更真实迅捷具有一定信息容量和理性力度的新文体加以反映。正如黄远生所说：“今欲发挥情感，沟通社会潮流，则必提倡一种新文学；今欲睿发智虑，输入科学，综事布意，明白可观，则必提倡一种近世文体。”[②]晚清出现了风靡一时的新文体“报章文体”。文学史家阿英认为：“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清末产生了一种新型文学，就是谭嗣同所说的‘报章文体’，也就是‘政论’。”[③]阿英正确地揭示了“报章文体”产生的物质条件和时代背景，但他将“报章文体”等同于“政论”，则失之于片面。其实，谭嗣同所说的“报章文体”是“兼容并包”的。他认为：“报章文体……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他将《报章文体说》别称为《报章总宇宙之文说》[④]。以“报章文体”主要实践者梁启超的作品视之，其中既有如《少年中国说》等以时评说理为主

① 萨特：《为了什么写作》，见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上海译文出版社灵愿苑年版。

② 黄远生：《远生遗著》卷源商务印书馆灵愿源年影印，第灵愿源页。

③ 阿英：《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序》，中华书局灵愿愿年版。

④ 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灵愿踪年版，第源愿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政论，也有《戊戌政变记》一类的新闻纪事。因此，“报章文体”实是现代杂文（政论）和报告文学（新闻作品文学）的重要导源。

由于文化生态直接决定着报告文学的形成和流变，因此，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比较清晰地探视报告文学史行进的轨迹。

许多治文学史的学者往往直接移用社会发展史的分期方法，将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与社会史的分期对接。这种方法考虑到了文学对社会政治历史的关联，因而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又忽视了文学史本身的演进规律，所以存在着片面性。文学史家范伯群曾说：“文学往往受影响于政治时期而又有其自身内在的节奏与律动，以此跨出自我的步幅。”“国家的政治大事可以成为历史划界分段的依据和标志，但是文学的发展并不一定与国家的政治大事件同步。”[①]在各种文体中，报告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最为紧密，但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可以等同于政治史。因此，依据文化生态的变化，观照报告文学本体的内在律动，我们可以将百余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分成三个阶段：近代文化文化转型与报告文学的发生；政治文化制导与报告文学的发展；现代文化建构与报告文学的成熟。第一阶段由灵恕世纪后半叶到圆园世纪圆园年代，这是报告文学的自发期；第二阶段由猿园年代至远园年代，此为报告文学的自立期。第三阶段由苑园年代末肇始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是报告文学的自觉期。这样的划分，只是从整体上描述了中国报告文学演进的坐标系，给出了一种发展的总趋势。文学史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而呈现出曲线状。

报告文学的自立期也就是报告文学的发展期，但其间的发展是颇为曲折的。自立期的猿园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开局便见精彩的一个重要时期。抗战初期因着战争的特殊环境和国共合作的政治氛围，一度时期报告文学曾经成为文学的时代交响中的劲歌。但此后国统区的报告文学便渐见沉寂。缘园年代初涌现出一批反映抗美援朝和新中国建设的报告文学，创作颇见繁荣。而反右风暴的突起又使报告文学趋于萧条。大跃进时期所谓的报告文学已经变异，它们的价值在于为当时浮夸浪漫的政治立论伪造证据。到远园年代前期受到重创后的报

① 范伯群、朱栋霖：《灵恕恩—灵恕恕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灵恕猿年版，第灵页。

告文学渐趋恢复,但文革一开,又成为荒唐的政治滑稽戏中的一种道具,报告文学彻底地异化了。愿园年代报告文学轰动一时,而 怨园年代知识分子开始边缘化,人文精神佝偻与思想性的匮乏成为时代的症候,相应地报告文学也就呈现出了颓势。文学史的行进正如黄河一样,虽然它的路向‘ 毕竟东流去 ”,但在其中的行程中,却是九曲回环。这就是历史。

报告文学是近代的文化转型的产物。发生期的报告文学是一种自发性的文体,作者的写作并没有某种文体意识,其时的文体总体上是雏形化的,尚不具有完全的形态。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的质变过程中,文化在剧烈的碰撞中或破灭或新创。除了近代新闻为报告文学的发生提供物质条件外,促使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应运而生的正是晚清作为社会主潮的启蒙文化。近代启蒙主义或启蒙文化的兴起导源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忧患意识,但这常常将它视为个体的一种人生观,缺乏深度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作为国家民族整体的思维模式。偌大的封建王朝自以为是天中上国,睥睨夷蛮。诚然,中国曾有令世界注目服膺的繁荣时代。但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崛起,而固步自封的封建专制的中国终于陷落,“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 ”①。中国成为列强鲸吞的鱼肉。当此艰危之际,一部分启蒙主义思想家,或来自封建阶级内部,或来自于新生的资产阶级阵营,由深度的危机意识激发出强烈批判意识 ;其批判所指是现存的腐朽破败的封建政制。批判意识在中国文化中大体上是阙如的,对王朝作集体性的抗议乃至批判实肇始于近代。启蒙主义者作思想启蒙,需要有相应的举措,他们或“ 公车上书 ”,或直接参与维新改革,或收徒讲学,或组织学会,同志相论,或办报创刊,但更为普遍的是作文著书,以此作为向社会发言的一种重要方式。报告文学发生期后期,辛亥革命爆发,漫长的封建统治从此终结,但军阀统治下的现实依然黑暗 ;反封建、反专制任重道远,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的主题。统观整个报告文学发生期,启蒙文化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存在。

① 龚自珍 :《尊隐》,《龚自珍全集》(上),中华书局 员怨怨缘年版。

报告文学正是这种启蒙文化的伴生物，同时报告文学又成为启蒙文化的重要成果。服从于这个时期启蒙的总主题，报告文学的取材呈现出重大性、政治性、开放性的特色，其有三种基本的主题取向。一是直接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腐败，代表性的作品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黄远生的《外交部之厨子》等；二是实录现实生活惨酷难堪的图景，主要作品有《被难始末记》、《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等；三是"睁眼看世界"，以旅行考察记的形式报告域外的政俗风情，作者着意记述与国内政制维新、民智开发、社会进步、文化建设等有关联者。这一类作品有王韬的《漫游随录》、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还有周恩来的《旅欧通信》和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

将20年代至30年代这一包含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的历史时期指认为报告文学的自立期，这是基于对文学史的史实所作出的一种判断。30年代报告文学开始拥有自己的文体称名，对它的理论研究也逐步展开，此间已经出现在报告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等。报告文学从无名之体一跃成为文坛的重镇。抗日战争初期报告文学更是异军突起，以群对此盛况作有描述："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①]五六十年代报告文学在文坛也占有一定的份额。1959年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报告文学座谈会。在座谈会的纪要中确认："从报告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谈，在全国解放以来的十三年中，在报纸和刊物上占有不小的比重，也产生了不少富有战斗性、反映了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可以认为，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已经独立地存在于文坛了。有些作品或被指认为散文，或被归入通讯一类，文体属性常常发生漂移。据此，有研究者认为报告文学尚没有取得独立的文体地位。其实，文体属性的漂移是作为边缘性文体的报告文学的一个表征。因

① 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苏文化》第20卷第1期，1947年6月15日。

为这一文体本来就具有某种互文体的特性([illegible])。在我看来,文体的独立与文体的成熟并不是一个等值的判断,两者之间虽有关联,但各有特指。一种文体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它的成熟。独立,更多的是指文体在文体序列中具有了一种“户籍”,表明它的存在;而成熟,则不仅表明文体的独立,更表明它已经走向自觉。从总体上看,[illegible]年代至[illegible]年代的中国报告文学是自立的,但尚不是自觉的。

中国的报告文学是一种显得“早熟”的文体。这一个判断意指它的自立,除了文体自身的生长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归结于环境的催生促长。这一环境即是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的自立更多的是一种“他立”。这种“他立”的实现,在于具有独特功能的文体与具有特殊需要的时代之间产生了一种双向选择的契合关系。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与此后的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本质性的重大区别。但就报告文学而言,虽然写作的具体内容与主题取向有了显见的不同,而社会政制的革命性变化,并没有截断三四十年代与五六十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某种内在的关联。佘树森、陈旭光注意到了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现当代散文之间变异相承的史实,指出:“[illegible]—[illegible]年代,时代剧变曾经引起散文观念的变革,造成散文天地的倾斜:以个性意识为主导的抒情小品体日趋衰落,而以群体意识为主导的通讯特写体则蓬勃发展。当代散文、报告文学的初创期,正是在这种倾斜的天地里开始的。从整体审美风范上考察,可以说:建国初期的散文,乃是‘延安散文’的延续,而建国初期的报告文学,则是[illegible]年代‘战地报告’的拓展。”[①]应该说这样的观点上颇有原创性的,但是它只是提示了一种关联性的现象,而没有揭示内在的具有实质性贯穿性意义的本因。在我看来,这本因就是强势的政治文化的制导。

自立期报告文学所居的政治文化生态,由于社会跨越了多种历史存在,因而它的内涵与景态有着许多差别。三十四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即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其时“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②]。[illegible]年日本侵占东北,发生

① 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illegible]年版,第[illegible]页。

②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实报星期偶感》,[illegible]年[illegible]月。

了“怨·员愿”事变，员怨猿苑年“苑·苑”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日的时期。尽管蒋介石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言行数有变化，但是战争初起时蒋介石还是宣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战争是政治极端的集中的体现，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压倒了一切的统一使用的政治话语，国家的公共话语。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使报告文学拥有了独特的“用武”之地。因为它具有真实快捷灵便反映战时社会状态，且特具鼓动性等文体优长。“小说、诗歌、戏曲……是炮兵、飞机队、坦克车队”，而报告文学等就是“轻骑队、游击队。”②可以说，在抗日战争中报告文学曾是作为一种特别能战斗的“武器”而参战的，它“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暴和压迫和侵略结合着，和人民大众争取民族解放的血泪的斗争结合着”，“和战斗者一同怒吼，和受苦者一同呻吟”③，因着这样的情势，“在战时的文坛上演了最活跃的脚色的，是报告通讯一类的小型作品。报告文学差不多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运动”④。

现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主题是民主革命，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及各种进步力量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报告文学被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形式从而得到“重用”。“报告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要大众地建设广大劳苦大众自己的文学，这是最重要的式样。”⑤“左联”执委会至少在两次有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决议中涉及报告文学，明确地要求“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illegible]）吧！”决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文学运动密切地和革命斗争一道地发展，也只有这样，我们作家的生活才能切实地改变，我们的作品内容才能够充满了无产阶级斗争意识”⑥。当时的无产阶级处于“在野”的地位，因而作

① 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员怨怨员年版，第 员猿页。
② 以群：《反映急激的事变》，收入《以群文艺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员怨愿猿年版。
③ 胡风：《论战争期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七月》（缘–远）员怨猿苑年 员圆月—员怨猿愿年 员月。
④ 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任务》，收入《抗战文艺论集》，文缘出版社 员怨猿怨年 猿月版。
⑤ 袁殊：《如何写报告文学——给在厂的兄弟们》，《文艺新闻》第 缘愿号，员怨猿员年 远月 远日。
⑥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左联执委会 员怨猿员年 愿月 源日通过。

为无产阶级文学样式的报告文学其基本的主题就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暴露而颠覆现存的统治秩序。“ 报告文学的目的是要暴露现有社会组织的缺陷,鼓励同一阶级的大众起来争斗。”① 猿园年代的报告文学名篇大多数是以批判见长的。被认为‘ 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记录 ’的《包身工》,作者夏衍截取包身工一天非人生活的场景,极其真切地报告了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劳动大众的悲愤遭际,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制度的一种控诉。萧乾的《流民图》在题材上是对《包身工》的补充,它对三十年代中国农民流离失所惨酷现实作了实录。而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则特选专制统治的一斑,以‘ 新闻剪集 ’的形式,真实、典型而不无讽刺意味地描写了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那种沉重的‘ 恐怖的氛围 ”。

政治文化制导下的报告文学,其基调总是两极对立式的,即或为沉郁激愤的批判,或为昂奋抒情的歌颂,可以认为政治主导是造就报告文学歌颂—批判模式的文化机制。这种歌颂与批判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批判的是异己的政治力量,其时主要是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阶级的敌人——独裁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歌颂的当然应该是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和进步事业。作为一种新兴的肩负着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政治力量,在其革命的过程中必然也存在着落后的东西,但特定的情势决定了对落后的处置采取的是内部的、组织化的方式,而不允许用文学这种外化的传播的方式。

对此,丁玲的例子可能是有说服力的,丁玲是一位向往革命、热心投奔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但到了 员怨源圆年,大约是因为有一点知识分子喜欢思考的品性,所以写下了《三八节有感》等对延安的某些现实表示不满的文章。她对延安‘ 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 ’表示异议,认为‘ 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 ”,应该向鲁迅先生学习,“ 为真理而说,不怕一切 ”②。但事实证明丁玲的理想是不合时宜的。“ 人不能在一种怀疑的、批判的、理性的状态下投身革命。一面在痛击国民党,一面又十分理性地反思共产党的每个举措,

① 《如何写报告文学——给在厂的兄弟们》,《文艺新闻》第 缘愿号,员怨源圆年 远月 远日。

② 《丁玲文集》第 源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员怨愿圆年版,第 猿愿猿-猿愿源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